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八旗十论

张佳生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满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八旗十论

张佳生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张佳生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旗十论 / 张佳生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6

(满族 (清代) 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80722 - 609 - 3

I . 八… II . 张… III . 八旗制度—文集
IV . D69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8221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1500

出版时间: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徐 力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 - 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重读甲申	
——写在八旗入关 360 周年	1
“八旗意识”论	34
八旗入关前满洲的民族认同意识	70
八旗入关前民族人口的迁徙集结及其作用	90
八旗制度对满洲的整合作用三论	126
八旗中“汉人满化”现象论析	230
八旗文学分期论	250
八旗文学的形成基础	279
八旗诗歌的主要风格及形成原因	298
满族文化研究百年	310
后 记	339

重读甲申

——写在八旗入关 360 周年

八旗入关是在公元 1644 年的甲申年，甲申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确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八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文从“八旗入关”角度解读甲申。

郭沫若先生解读甲申，从总结李自成失败教训入手，故有《甲申三百年祭》问世。2004 年亦为甲申之年，有人仍从此角度解读甲申，然似无超越郭老之见者。另有人从“清军入关”角度解读甲申，然“清军”应指“清朝军队”，此处之“清军”指入关前耶？或入关后耶？因两者之内涵并不相同。清初尚无“清军”之称，有之，实后人强加之耳。当时入关之初，是以八旗为主力，辅之以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汉兵军队。八旗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顺王及续顺公兵虽未编入八旗，但其建制与八旗同，仍属八旗范畴。《清太宗实录》载，崇德七年（1642）八月二十七日（9 月 20 日），“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奏请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上允其请，命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① 故而此

^① 《清太宗实录》卷 62，第 10 页。

时之“清军”实乃为八旗。

如以八旗为“清军”，则与入关后“清军”之内涵又有不同。顺治元年以后（甲申以后），吴三桂数万人马以及陆续被收编的明军所建的“绿旗营”，均可一体称为“清军”。不过这已经是八旗入关以后的事情了，而且他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显然不能与八旗同日而语，更何况康熙年间的“三藩”成为八旗的敌对势力。

以此而论，重新解读甲申的角度，以“八旗入关”较“清军入关”更为客观。

以“八旗入关”角度解读甲申较为合理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作为统治主宰的清廷一直视八旗为一整体，以八旗为核心与中坚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和措施，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无八旗作为支撑，能够实现长达 268 年的清朝统治则无法想象。

从这个角度解读甲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作为满洲、蒙古、汉军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的社会集团入关之后，不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其自身在入关后的二百多年间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在种种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许多是以往朝代所未能产生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认识仍有启示作用，这也是“清军入关”这个范畴所难以涵括的。

八旗入关之后，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以一篇文章难以尽述，现仅择其大端，论之如下。

一、八旗入关与大一统局面的初步形成

八旗入关与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长久的稳固有着直

接而密切的联系，在实现大一统的局面中，八旗成为支撑与维护大一统局面的核心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八旗自入关开始就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八旗入关之际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势，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同时存在。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已占领北京，张献忠的大西军势力强大，明朝宦绅在南方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后又有南明隆武政权和浙江政权及永历政权）。而后不久，大西军余部孙可望建“国主”政权，郑成功收复并占据台湾，至于其他反抗活动更是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争历时既长而又艰苦卓绝，八旗成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的中坚势力。

在这一过程之中，八旗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局势发展的主宰。

八旗首先针对的是李自成起义军。甲申（1644）四月八旗入关，4月21日至26日与李自成在山海关一带展开大战，李自成战败。4月29日李自成率部撤离北京，5月2日摄政王多尔袞率八旗入京，10月1日顺治帝举行即位大典，“大清”以中央政权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八旗主力及其家眷迁入关内，从此中国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此年10月以来，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率八旗大军追歼李自成军。次年正月占领西安，随后追击李自成至河南、江西、湖南，5月李自成遇害，大顺军势力一蹶不振。

自顺治二年（1645）三月起，豫亲王多铎率八旗大军由河南进军江浙、湖广。五月十五日（6月13日）灭南明弘光政权。自此西北与江南长江中下游均被八旗占领。

顺治三年（1646）正月，肃亲王豪格率军征张献忠于四川，贝勒博托率军征浙东、福建。豪格大军三月至西安，五月

破汉中，七月进入四川，十一月张献忠中箭身亡，大西政权瓦解。博托一路三月至杭州，至八月初浙东均被八旗攻占。随后进军福建，如入无人之境，九月福建平定。

顺治四年（1647）春，八旗开始进攻广东、广西、贵州，至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悉平。

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大军由信郡王多尼为安远大将军，总统三路大军（贝子洛托与经略洪承畴为一路，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与都统墨尔根为一路，都统卓布泰与提督钱安国为一路）入云南，不数月皆平定。至此，中原、江南、闽浙以及云、贵、川、广、湖五省皆平，大一统局面初步形式。

在清初统一战争中，八旗主力进入关内。1644年5月14日，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袞，“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启行”^①，向山海关进军。在入关后的一系列战争中，虽然也有外藩蒙古和被收编的明军参战，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一直是战争的主要力量，所有的重大战役都有八旗官兵参加。

从前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八旗入关后参与了二十多年的统一战争，以10万之众在南征北战中无坚不摧，最终控制了全国的局势，八旗在这统一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八旗何以能战胜数十倍的敌对势力而立于不败之地？清人魏源在《圣武记》中给予了评说，“八旗有禁旅，有驻防。禁旅八旗，满洲六万，并蒙古、汉军共十万。其人皆东海、扈伦诸部落，无在黑龙江北、宁古塔东者，其汉军亦无远在山海（关）内者。此周庐执戟之亲兵，势不能尽数以行。若夫驻防之兵，则即八旗佐领中之余丁，佐领外之新附，随时编籍，人

^① 《清世祖实录》卷4，第9页。

无定额，散居辽河东西诸城，无事射猎耕屯，有事驰驱介胄。……平地则八旗并驱，险隘则八旗鱼贯，斯其制也。矛盾如墙前进，轻骑傍伺电发，又其制也。前烽火器超鹿角以出阵，反则分前锋之半为殿，又其制也。高宗《实胜寺记》曰：‘西师之役，命健锐云梯兵数千为先锋，凡行阵参伍弥缝之际，略觉鼓馁旗靡处，得健锐兵数十屹立其间，则整而复进。斩将搴旗，虽以索伦兵之驰突一往，而知方守节，终不如我满洲世仆，其心定，其气盛。’乾隆尚尔，国初可知，索伦尚不如，绿营可知。”^①由此可知，八旗严整的军纪和强大的战斗力是取胜的关键，倘无八旗，这种初步统一的局面在短时期内无法完成。如无八旗入关，在当时几种势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历史将如何发展则难以预料。

二、八旗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

八旗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平叛方面。

清初，以八旗为主力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三藩”势力逐渐强盛，有尾大不掉之势。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在云贵反叛，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继茂子）反，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先叛后降，定南王孔有德顺治九年（1652）卒，其部由抚蛮将军孙延龄等统辖，于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反。至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三藩”势力被平定，历时八年之久。

平定“三藩之乱”是维护统一的重大事件。当时“三藩”

^① 魏源：《圣武记》卷1，开创，第5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及其他反叛势力波及湘、滇、黔、川、闽、桂、陕诸省，且“三藩”之军队多经过清初之战争，战斗力亦属强大，以八年时间始控制局势，足可见平叛之艰难。

在此次平叛过程中，虽有绿旗营兵参战，然其主力仍为八旗。

吴三桂反叛之初，康熙帝即以八旗和八旗将领为依靠指挥平叛。当反叛消息一传到后，康熙帝立刻调遣八旗：

“选遣都统巴尔布等，率满洲精骑三千由荆州守常德。命都统珠满，以兵三千由武昌赴守岳州。命都统尼雅翰、赫业、席布、根特、穆占、佟国瑶等，分驰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郟阳、汝宁、南昌诸要地，听调遣。削吴三桂官爵，宣示中外，下其子应熊及家属于狱。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师至荆州。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而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军事。”^①

随后又任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图海为定远大将军，率军讨伐。这些统帅都是八旗满洲之亲贵，是各方面军的最高将领。此外担当各地战场统领的也多是八旗将领。如负责取岳州、长沙之镇南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等，取四川的安西将军赫业等，取福建的平南将军赖塔等，取江西、福建的定南将军希尔根等，取广东的平定将军特巴图鲁、席布等；镇守宜昌的都统宣布理等，镇守郟阳的都统港达礼等，镇守西安的镇西将军卜臣等，镇守汉中的副都统扩尔坤等，镇守山东、河南的镇东将军喇哈达等，镇守京口的安南将军华善等，镇守江宁、安庆一

^① 魏源：《圣武记》卷2，藩镇，第6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线的扬威将军阿密达等，镇守杭州的浙江将军图喇等，都出身于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

此外在八旗汉军中最著名者是正白旗汉军人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平“三藩之乱”中，他被授为绥远将军，总统绿旗营兵，“偕八旗兵进剿”，功劳亦不小。其他如镶红旗汉军福建布政使姚启圣、镶红旗汉军四川总督杨茂勋、正白旗汉军甘肃总兵孙克思、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佟国瑶、正黄旗汉军江西巡抚佟国正等，都在平叛中立下了战功。

当然对这次历时八年的战争所取得的胜利，还应看到康熙帝所起到的作用。他以八旗为主力，以绿旗营为辅翼，审时度势，调度有方，成为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此后在一系列重大统一平叛战争中，如康熙朝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之乱，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三次亲征，以八旗将领为主帅，以八旗为主力，平定了反叛。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五十九年（1720）驱逐了准噶尔军稳定了西藏。雍正元年（1723）至二年，以汉军旗人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八旗与绿旗营兵平定了厄鲁特蒙古的罗卜藏丹津叛乱。乾隆年间曾多次用兵，平定了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征战准噶尔部生擒达瓦齐，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等等。在这些战争中，每次都有大批八旗将士参战，如乾隆年间进剿回部大、小和卓木，最多时用兵近2万余，其中八旗兵8000多人，绿旗营兵近万人。绿旗营多为步兵，八旗则多为骑兵并以火器营、健锐营为主力，战斗的机动性和战斗力都很强大，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八旗在稳定统一局面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驻防于各地稳定局势方面。八旗入关之初，直省驻防只有江宁、西安两

处。“三藩之乱”后，自康熙十九年（1680）始，直省驻防制度开始建立，相继调八旗兵驻防福州、广州、荆州、杭州、京口、张家口、热河、宁夏、凉州、成都、开封、潼关、青州、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绥远、归化等等，这些地方都是军事上的“紧要”之处。他们或数百名或数千名，携家带口被派驻各地以维护社会稳定，应该说他们所作出的努力是包含着牺牲精神的。

三、八旗与“大一统”观念的扩展

自春秋之时，南方楚国兴起，屡屡北上，开疆拓土，是以华夏故地不堪其扰，故《春秋》一书提出“华夷之分”说。

清以异族入主中原，汉人多有家国陆沉之痛，随以“华夷之分”为理论旗帜，反抗清朝统治。对汉人的这种思想旗人早有准备。在八旗入关之初，在大批任用明朝降官，大量收编明朝军队的同时，举行仪式安葬崇祯皇帝并封明皇室成员为王公，而且一再声明清之立国非得之于明，乃得之于李自成，是从李自成手中接续了王朝的正统。与此同时，清朝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继承了原来的法统与道统。在法律方面，《大清律》与《大明律》甚相仿佛。在思想礼制方面，仍以儒家为正宗，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在全国各地广建孔庙，即使八旗驻防之地亦无不修建。此举不仅迎合汉人的历史文化传统，也表现了八旗吸取儒家思想之意。

尽管如此，民族矛盾并非一日可以化解，“华夷之辨”仍是汉人反抗清朝的理论武器，时至雍正朝终于出现了曾静反清案。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反清，事发，雍正帝作《大义觉迷录》进行批驳。

曾静写有《知新录》一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以

“华夷之辨”诋毁清朝，他认为“中华之外，四面皆夷狄”。“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这种观点从当时现实社会状况来看，反映了清初矛盾的激烈。而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则有固守旧俗之嫌。

“华夷之辨”的思想发端于《春秋》，至战国之际，楚越等国已渐被纳入华夏系统，历史之进展使华夷的内涵发生变化，故孟子顺应时局，提出了“大一统”的新思想，因此“华夷之辨”的思想早在战国时即已落伍，“大一统”应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

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虽然是为镇压汉人反抗所作，有阶级和民族镇压的作用，但是在打破“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定式方面，却也有新奇之见。

在这方面雍正帝有两个主要观点：其一是将满洲（八旗）纳入大中华的系统之中，极力表明八旗是大中华的成员；其二是提倡“大一统”思想观念，将各族都纳入到“大一统”的国家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在批驳汉人“华夷之辨”思想的时候，也同样以儒家思想作为理论武器。

他在《大义觉迷录》卷一中说：“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①而八旗能够定鼎北京，即是因有“大德”之“外远”。进而又借“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②之语，证明自古以来有德之夷，亦可君临天下。并且清建立全国政权，

① 《大义觉迷录》卷1，第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大义觉迷录》卷1，第2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①，是得之于李自成，是以说明清得统之正。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②的新颖观点，从而将“满洲（八旗）”纳入到天下一统的大中华系统之中。

对“大一统”的内涵雍正帝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大义觉迷录》卷一中，他认为清之统治是处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时期。“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獬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③在这段话中他阐述了两个观点，其一是“华夷之分”是有限性的，其二是在“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时期，“华夷中外之分”已不合时宜，“天下一家”的理念应取代“华夷之辨”，将版图内所有民族视为一体，从而动摇了“华夷之辨”传统的根基，引申扩展了孟子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其实在雍正朝之前，以八旗为基本力量和统治根本的清廷，就已经开始经营“大一统”中国的建设了。如从顺治开始即加强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并且“尊儒崇道”，举行科举，吸纳汉人进入统治阶层。康熙朝则加强中央集权，改善经济环境，发展以汉传统为主的汉族文化，统一漠北与青海，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加强对西藏的统治管理，反击沙俄

① 《大义觉迷录》卷1，第2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大义觉迷录》卷1，第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大义觉迷录》卷1，第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入侵等等，都是以“大一统”作为基准点的。这一切的后果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强盛帝国出现在东方，民族间的认同感开始增强，不仅促进了民族向心力的发展，而且一个新的“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逐渐形成，只不过雍、乾以来这条道路被越走越宽罢了。到了乾隆朝，中国的国势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便足以说明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八旗向以维护“大一统”为己任，他们除了参与了所有维护统一的战争之外，还在其他很多方面作出了牺牲与贡献。正是八旗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对国家的统一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八旗与八旗意识

八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行政、军事、社会、生产职能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集团。八旗具有严密的制度，如八旗兵制、八旗官制、八旗户籍制度、京师驻防制度、直省驻防制度、八旗法规、八旗土田规制、八旗仪制、八旗军礼制度、八旗冠服制度、八旗教育制度、八旗恤典制度、八旗军功制度、八旗俸禄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使八旗成为一个组织性很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群体。

八旗的民族构成较为复杂，它是以满洲为核心，以蒙古和汉人为主体的，兼容了少量锡伯、朝鲜、回、藏以及部分赫哲、达斡尔等民族之人组成的。晚清之际，国子监祭酒盛昱曾对八旗的民族构成有清晰的阐述，说八旗乃“取大兴安岭以南，库页岛以西，松花江、嫩江合流处以东，六甸以北之人百分之一，曰‘满洲旗’。取黄河以东，瀚海以南，嫩江东岸以西，长城以北之人千分之一，曰‘蒙古旗’。取故明辽东都司，以及十三布政司之人万分之一，曰‘乌真超哈旗’，今名‘汉

军’。喀尔喀、准噶尔、回部、番子，亦时编入。以黄、白、红、蓝、镶正别之。宗室、觉罗各随其所食采地之户，亦系旗。是曰‘八旗’。凡不入旗之满洲、蒙古曰‘丁’，汉人曰‘民’，番、回仍其称。”^①

这段记述可以反映三个事实：一是八旗中有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建制；二是八旗并非由单一民族而是由多种民族组成；三是八旗内的民族人口只占本民族的极少部分。汉军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使是满洲，还有99%的满洲人不是旗人。而在蒙古人中，999%的蒙古人不是旗人。因此认为所有满洲人都是旗人的看法，显然是不确切的。

由此看来，八旗是一个跨越了民族界限组成的社会集团。这主要表现在它并非由单一民族而是打破民族界限由多种民族组成，同时八旗中的民族也并非是这个民族的全部人员。多个民族的部分人口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政治目标明确的社会群体，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因此它的存在也就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八旗是一个存在了三百多年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除了对它的发生发展的历史需要研究之外，更应在深层次上对它开展研究，其中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加强对“八旗意识”的研究，因为八旗的种种表现几乎无不与八旗意识有关。

八旗意识是清代旗人的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具备了种种形成的基本条件。如它有比较漫长的发展历史，它有极其严密的管理制度，它规范了旗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它形成了具有共性的思想文化，它强化了旗人共同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它具有赖以存在和控制局势的军事

^① 盛昱、杨钟羲：《八旗文经》卷60，第478页，辽沈书社1988年版。

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八旗是以旗统人，旗人与丁、民、番、回界限清晰。久而久之，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视旗人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社会身份。在这种环境与背景下，八旗意识的产生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八旗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它的作用与价值。

我们知道，国家有国家意识，民族有民族意识，八旗意识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意识。它既非国家意识或民族意识，却又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密切相关。应该说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八旗意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八旗一直是支撑国家这个大厦的柱石之一。又因为八旗是由多民族组成，旗人的身份拉开了他们与民族母体的距离，但是源远流长的民族属性又不可能彻底割裂与本民族母体的联系，故而八旗意识从某种角度上说应该是民族意识的提升或变化。在中国这个具有特定条件的大环境中，八旗意识的地位与处境就是如此。

当然，八旗意识的主要内涵还是自我意识、认同意识和自觉维护八旗利益的意识。八旗意识产生与存在的意义相当深远，其中最重要的是展示了中国民族间相互认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八旗不仅可以将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稳定的整体，而且能够使旗人在思想意识上达到统一。它既是中国民族关系状态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民族关系进程的一个典型。它的长期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作用，预示了中国民族能够更加和睦相处的前途与未来。

五、八旗与八旗精神

以往对八旗精神并没有人给予特别的关注，晚清以来